

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乡村社区学校的建设探究

——基于川南地区 S 村社区学校建设的启示¹

杨智^{1,2}

(1.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贵州贵阳 550002; 2. 贵州师范学院, 贵州贵阳 550018)

【摘要】: 乡村社区学校是乡村社区教育的实施机构, 包括社区学校、农村成人学校、农民讲习所等多种称谓, 它是乡村社区振兴的基层“智库”, 但现实中真正发挥“智库”价值的学校并不多见, 因此有必要结合实际建设高效的新型社区学校。正确认识乡村社区学校的现代价值, 坚持经济收益主导的建设原则, 探索社区主导的多主体协同建设机制, 构建实体与虚拟融通的学习平台是新型乡村社区学校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 乡村振兴 社区学校 建设经验 启示

【中图分类号】: G4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24 (2019) 01-084-091

一、引言

乡村社区学校的名称表述较多, 包括乡村社区学校、社区学习中心、成人学校、农民文化技术学校等称谓, 其职能是为社区治理提供智力、文化与精神等支持。国家十分重视乡村社区学校的建设, 截止 2015 年, 仅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培训学校(机构)达到 82167 所, 教学班(点) 237649 个, 其中村办学校数 64576 所, 教学班(点) 110217 个。^[1]为充分发挥社区教育全面服务新型社区建设的职能, 2016 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教职成〔2016〕4 号)提出要“建立健全城乡一体的社区教育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办学网络”, 乡村社区学校获得新的发展机遇。与传统意义上具有社区学校性质的教育机构(如成人学校、人口学校、农民文化技术学校等)比较, 新型乡村社区学校的服务领域更加广泛, 要求与社区的全面治理有机融合, 担负起促进乡村经济振兴、文化振兴、宜居乡村建设、青少年校外教育以及社会稳定的等功能。^[2]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 强化了乡村社区学校促进乡村社区全面发展的历史使命。然而, 现实中的乡村社区学校在各地农村仍是摸索前行, 尚不能完全有效地支撑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因此有必要总结出乡村社区学校建设的优秀经验, 以为同类乡村建设社区学校提供参考。

四川省威远县 S 村走在了同类乡村的前列, 先后获批省级社区教育示范教学点、现代农民培训示范基地与市级优秀学习型乡村等称号, 且教育部、省级与市级乡村社区教育现场会多次在此召开。本研究以此为案例, 深度挖掘 S 村社区学校建设的经验与不足, 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其对同类乡村社区学校建设的启示。S 村户籍人口 2300 余人, 常住人口 800 余人, 主要有无花果、琵琶、茶叶、葡萄与蔬菜等产业。社区学校作为服务 S 村全面治理的智力机构, 2103 年在原村级成人学校基础上改建而成, 主要承担村民思想政治、职业技术、文明礼仪、文化与卫生等教育任务。据不完全统计, 近 5 年来村民参与学习达 9800 余人次, 成功培训职业农民 200 余人, 发放各类学习资料 10000 余份, 培育“土”专家 52 人, 种植大户 200 余户, 科技示范户 186 户,

¹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青年课题“城镇化背景下西部农村成人教育组织建设研究”(CKA140127)。

作者简介: 杨智, 教育学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博士后工作站站博士后, 贵州师范学院贵州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社区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

有效地推动了 S 村的发展。

二、S 村社区学校发展的图景

著名管理学者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认为任何组织都包括相互调节、直接监督、工作流程、工作输出与员工技能标准化五种协调机制。^[3] 五种协调机制可分为两部分，相互调节、直接监督、工作流程与员工技能属于运行要素，工作输出属产出结果。受此理论启发，本研究主要从学校的运行要素与产出结果两个维度讨论 S 村社区学校发展。前者回答社区学校是什么样，后者回答社区学校到底产生何实质效果。

（一）社区学校的运行要素及其关系

达夫特（Daft, R. L.）基于明茨伯格组织理论提出组织主要包括技术核心、技术支持、高层管理、中层管理与管理支持等要素。^[4] 在乡村社区学校语境中，高层管理的职能主要是塑造发展愿景，技术核心即教育教学，因此关于乡村社区学校运行要素的讨论主要从愿景、教育教学及其支持，管理及管理支持三个维度展开。愿景是社区学校发展带给村民的理想图景，为达成愿景乡村社区学校需要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与管理工作。然而，乡村社区学校自有资源难以有效保障教学质量与管理水平，因此需要外界的智力与物资支持。这样愿景、教育教学及其支持、管理及其支持共同构成乡村社区学校的运行体系。

1. 社区学校的发展愿景美国学者彼得·圣吉（Dr. Peter M. Senge）

认为共同愿景是我们所追求的未来图景，“特别是有内在深度的愿景，能够激发人们的热望和抱负”，^[5] 增强组织的凝聚力。社区学校的愿景是村民对参与社区学校活动将会获得何种收益的展望，包括直接愿景与间接愿景两种类型。直接愿景也可称之为目标，是学习活动结束后学习者获得何种收获的预期，主要指学习者在观念、知识与技能上的变化。社区学校的主体是成人村民，村民根本的兴趣点不是直接目标，而是直接目标达成后会产生出的实际效果。实际效果与社区教育之间不是直接关系，而是模糊的间接关系，它才是居民参与学习的根本动力。基于这样的判断，这里主要讨论 S 村社区学校的间接愿景。S 村社区学校的愿景即居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这种追求与国家的乡村建设政策密不可分。就发展的视角而言，S 村社区学校的愿景塑造经历了移植期、凝练期与成熟期三个基本阶段。（表 1 所示）

表 1 社区学校愿景

阶段	时间	愿景内容
移植期	2012 年及以前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凝练期	2013—2014 年	先进乡村、致富乡村、文明乡村、和谐乡村、美丽乡村
成熟期	2015 年及以后	先进乡村、富裕乡村、文明乡村、宜居乡村、学习乡村

移植期是对国家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方针的移植，这期间的愿景更多是停留在文字层面，尚未结合乡村实际有效地内化为居民所有。2012 年威远县成立了社区教育指导中心并且制定了《威远县社区教育实施方案（试行）》，在社区教育指导中心的推动下 S 村社区学校开始了本土化的愿景探索，提出了先进、致富、文明、和谐与美丽等乡村愿景。2015 年，社区教育指导中心与社区学校根据国家乡村建设政策的实际，重新凝练了乡村建设的愿景，即“先进乡村、富裕乡村、文明乡村、宜居乡村与学习乡村”。为了使间接愿景与社区学校的实际结合起来，社区学校提出了与之对应的五个教育内容模块，即党员教育对应先进乡村，职业教育对应富裕乡村，道德与法制教育对应文明乡村，环卫教育对应宜居乡村。尽管这种对应逻辑上不尽合理，但在现实中有效地增进了社区教育活动与愿景的关联度。

2. 社区学校教育教学及其支持

教育教学是乡村社区学校的核心要素，是把社区学校与其他类型的学校区别开来的标志，愿景的实现需要教育教学的支撑。S村社区学校作为最基层的社区教育机构，其教师资源与课程资源较为匮乏，加上学员自身的文化素养也难以有效地为教育教学的实施提供有力支撑，因此教育教学的实施需外部的智力支持。

第一，S村社区学校的教育教学要素

教育教学是社区学校运行最为核心的要素，类似工厂的生产部门，它是社区学校中相对独立的系统，主要包括教师、学员、教育主题（内容）、组织形式、教育教学方法以及教育场所六个要素。（表2所示）

表2 社区学校的教育教学

要素 时间	教师	学员	内容	形式	方法	场所
2012年及以前	量少、兼职、业余。	群众少、干部多。	党建、政策、法制、健康。	集中式、随境式。	讲授、广播、标语、传单。	教室、家中、路边、墙上。
2013—2014年	量增、较专业，兼职。	全员参与	增加：文化、职业、道德、环保、卫生	增加：小组、班级、远程、参观。	增加：现场教学、讨论、劝导、咨询。	增加：基地、谈心室、博物馆、广场。
2015年及以后	量足，稳定，专业，	全员参与	增加：亲职教育。	增加：在线。	同上	增加：村小学

表2所示，2012年及以前，S村在新农村建设项目的支持下零星地开展社区教育工作，社区学校教育教学的总体水平偏低，形式化现象较为严重。2013年，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下S村开始发展果蔬、乡村旅游与葡萄酒等产业，村容村貌建设工作同时启动。教育教学的实施获得了依托的载体，与居民生产生活的联系更加紧密。2015年及以后，随着S村新型乡村建设框架基本成型，相应地教育教学要素发展也基本稳定，从追求规模与数量向关注内涵提升逐步转变。

第二，S村社区学校的教育教学支持

教育教学支持主要源自社区学校外的智力支持，其目的在于保证教育教学顺利实施以及提升教育教学质量。S村社区学校所获得的智力支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专业教师的支持。2012年及以前，教师以兼职为主，且专业水平普遍偏低。2015年及以后尽管教师仍以兼职为主，但教师的专业水平已得到较大的提升，教师的来源从2012年及以前的政府机构、村支委扩展到大中专院校、科研机构与企业等，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教育教学质量。二是专业指导人员的支持。2012年以后，县级社区学院的成立为S村社区学校的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在其大部分培训活动实施过程中县级社区学院都会派相应的教师与授课教师进修交流，提升学员的学习基础以便于教师更好地授课，同时教师授课结束后县级社区学院的支持人员还会把学员的反馈意见交给授课教师，以此作为教师改进教学的依据。

3. 社区学校的管理及其支持

第一，S村社区学校的管理体系

管理是社区学校的职能结构及各要素之间关系的描述，在现实中表现为纵横交错的管理体系。S村社区学校的管理体系主要包括纵向的“两级管理”与横向的“教治融合”。“两级管理”指村级社区学校与组级教育教学点两级管理。尽管S村常住人口800余人，但其分布在16个村民组中，社区学校难以辐射到所有的村民组，因此才探索出“村组共教”的两级管理模式。村级社区学校负责统筹全村的社区教育工作，在各村民组设置教学服务点，组长为组织者也是教师，协助村级社区学校开展工作，同时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村民提供指导。“教治融合”指S村基于未来图景实现了社区学校与社区治理的有机融合。社区治

理的责任机构是村支委，“教治融合”事实上是社区教育与村支委工作的融合。现实中主要表现为“机构融合、人员融合、内容、方法与评价的融合”。机构融合指 S 村社区学校与村支委共享设施设备与场所。人员融合指村支委与社区学校管理队伍融合，村支部书记余某即校长，村长即常务校长，其他村委成员都在社区学校承担相应的工作。内容与方法融合即村支委工作与社区学校教育教学共融共生，从而形成了在教育中治理，在治理中教育的格局。如村支部书记余某所言，“村里有时候有婆媳吵架闹到村支委，我们上门去调解，调解过程就是社区治理过程，也是送教上门的过程。”（2017 年 12 月 20 日）

第二，S 村社区学校的管理支持

S 村社区学校的管理支持主要包括管理技术支持与管理物流负载支持。管理技术支持指 S 村社区学校的管理上得到来自他者的智力支持，主要包括相关研究人员亲临现场指导与社区学校管理人员外出培训两种形式。前者主要源于县级社区学院（社区教育指导中心），亲临现场与电话咨询是其常用的指导方式。后者主要是把社区学校的管理人员派到村外接受专业培训，以此提升专业管理水平。物流负载指社区学校正常运转所需的经费与物资。物流负载是管理工作不可忽视的构成要素。S 村社区学校物流负载的来源主要包括帮扶与自筹两种路径。2012 年及以前，主要的物流负载源自国家与地方农业部门、科技部门、文化部门与扶贫机构。此后在合作社的带领下村产业不断兴旺，产业开始反哺社区学校，社区学校每年从产业盈利中提取 5% 作为运行经费。2015 年以后 S 村社区学校已实现完全的自给自足，并且参与集中学习的学员还能免费用餐，且获得数额不等的交通补贴。截止 2017 年底社区学校结余 10 余万元经费。充裕的经费保证了 S 村社区学校的正常运行，也有助于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

（二）社区学校的成果转化概况

本质上，社区学校与社区发展之间更多是间接关系，即社区学校影响社区居民，社区居民生产或创造理想的生活。理想生活是社区居民的最终追求，因此讨论社区学校的图景需要讨论社区学校教育成果的转化情况。这里主要结合 S 村的发展愿景探讨社区学校的成果转化情况。

1. 思想政治教育促成先进乡村

乡村振兴的首要环节是破除保守的观念，以积极、开放的心态面对新的思想与事物。S 村把社区思想政治教育与社区的美好图景有机衔接起来，破除了村民的保守观念，促动其以积极、开放的姿态投入到乡村建设中。具体而言，思想政治教育促成先进乡村主要依托三条路径：一是思想政治教育以全村的 64 名共产党员与村组干部为主，通过其影响辐射到其他村民。例如，S 村近五年来未出现过上访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相关活动可以归功于思想政治教育。二是思想政治教育以集中学习与宣传为主，尽可能让所有村民认识破除陈旧观念的必要性与国家乡村建设政策的优越性。三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是以 S 村建设所需解决的实际问题为主。例如 S 村的整体规划需占地与庄稼、投劳与土地流转，S 村把思想政治教育与此类问题的解决有机结合，凝练并在实践中践行了“三不赔”（乡村发展涉及的占地不赔、损坏青苗不赔、投入劳动力不赔）与党员干部“三不准”（不准拿群众东西，不准说伤群众的话，不准损害群众利益）。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引领，S 村走在邻近乡村的前列，产业规划、村容村貌与乡村旅游等发展势头良好，甚至部分村民到邻近村庄承包土地发展产业。

2. 职业教育促成富裕乡村

思想是先导，经济是根本。S 村把职业教育与富裕乡村有机融合起来，推动了富裕乡村的形成。职业教育与富裕乡村的逻辑关系为社区教育提升村民的职业技能，村民再把职业技能转化为经济收益，最终实现乡村的富裕。调查发现，自 2012 年以来，S 村的职业技能培训共计达到 8000 余人次，主要包括无花果、琵琶、蔬菜、葡萄等种植技术培训，草鱼、家禽、家畜等养殖技术培训与厨师、电工、焊工等实用技术培训。通过职业技术教育的推动，S 村的乡村产业蓬勃发展，给居民带来了实际收益，反之也调动了居民参与学习的积极性。例如，2012 年以前 S 村以传统农业和“打工经济”为主，人均年收入不足 7000 余元，历经产业的发展及与之匹配的职业技能培训，2017 年人均年收入突破 16000 余元。尽管上述数据并非全是社区教育之结果，但社区

教育至少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3. 道德与法制教育促成文明乡村

以文明乡村为目标导向，S村开展了相应的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主要通过集中学习、自主学习与宣传三种形式展开。由于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本身的经济效用不甚明显，难以把居民集中起来，因此相关的集中学习主要融于职业教育类的活动中。如在职业教育活动实施前或过程中进行半小时的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道德与法制教育的外来教师主要源于公安机关、法院与其他教育机构，学校自身的教师主要是社区学校校长余某。通过社区学校的影响，S村2014年被评为省级文明乡村。据社区学校校长余某描述：“2010年前还发生过两起因借钱不还而打官司的事件，后来通过教育与宣传，直到2018年全村再无官司出现。道德问题主要是婆媳关系与赡养问题，通过集体教育与上门劝导这些方式，差不多有三年没有发生过类似事件。”（2018年10月2日）此种说法在对村民的访谈中也得到了验证。

4. 卫生教育促成宜居乡村

村容整洁是宜居乡村的重要标志，村容整洁最基本的衡量指标即环境卫生好。S村以乡村旅游开发为契机，把村容整洁与乡村旅游发展有机融合起来对村民实施卫生教育。卫生教育主要包括环境卫生教育与个人卫生教育，目的在于为村民构建宜居的环境，塑造乡村旅游品牌。通过旅游经济的推动与卫生教育的实施，讲究卫生与爱护环境已成为村民的自觉行动。如村民余某所言，“以前我们这里的很多人都不注意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自乡村旅游兴起后，社区学校把乡村旅游与卫生结合起来开展教育，乡村还组织了义务清洁队与个人卫生纠察队，现在我们村应该是附近这些村中最干净的村”。（2017年8月18日）

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职业教育、道德法制教育与卫生教育的实施，辅之以其他的教育活动，S村的村民已逐步养成自觉学习的习惯，基本实现了从“要我学”到“我要学”观念的转变，推动了“学习型”乡村的形成。如村民陈某所言，“以前我们都不喜欢学习，没事就在家看电视，这几年我们发现学习给我们生活带来了改变，因此没事的时候我都去社区学校看书、读报、下棋、跳舞”。（陈某，村民，2017年8月19日）

三、S村社区学校建设的经验与存在的不足

（一）S村社区学校建设的经验

1. 经济刺激是社区学校发展的动力源泉

经济是乡村社区发展的基础，乡村振兴最为重要的是经济振兴，经济振兴反之促进政治、文化与教育等方面的振兴。S村社区学校取得良好发展的根源在于社区学校的建设与S村经济发展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社区学校的主要服务对象为乡村经济。村民为追逐经济利益，于是积极参与到社区学校建设中。尤其在社区学校建设的初期，很有必要把经济收益与社区学校建设结合起来。首先，S村的职业教育是与经济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它通过对村民实施种植、养殖与实用技术培训，村民获得此类技术后通过无花果、琵琶、蔬菜等种植与草鱼、家禽家畜养殖以及务工等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益。其次，思想政治教育与村民的经济收益也密不可分。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为思想政治教育是为破除乡村民众的守旧思想而存在，破除守旧是为乡村全面治理扫除思想障碍，而经济治理是乡村治理的根本。第三，在S村卫生教育同样被赋予经济价值。乡村旅游经济的刺激是促成良好卫生教育效果的重要因素，村民为从乡村旅游中获得经济收益，必须参与卫生教育活动。第四，道德与法制教育尽管不能产生直接经济效益，但是在经济的视角上，它有助于降低治理成本，同时也能为产业发展提供有序的环境，因此也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总而言之，可以这样理解，经济因素调动了S村居民参与社区学校建设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2. 组织设计是社区学校发展的技术关键

组织设计理念源于亨利·法约尔（Henri Fayol）与马克思·韦伯（Max Weber）等人，他们认为良好的组织设计有助于组织的有效运行。S村社区学校的组织设计优势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教育组织最基本的要素在社区学校中都存在，并且形成紧密的逻辑关系。愿景是社区学校发展精神动力，为实现愿景社区学校分为教育教学与管理两个模块。教育教学包括教师、学生与活动开展保障性资源。管理主要指构建了以“教治融合”与“两级管理”为特征的管理体系。为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与管理水平，社区学校还分别建立相对完善的教育教学支持体系与管理支持体系；二是学校与社区全面治理有机融合。S村社区学校的服务宗旨是促进社区的全面发展，因此在设计上实现了社区学校的职能与乡村治理职能的有机融合，让社区学校找到了发展的现实基础，社区治理也获得来自社区学校的智力支持；三是组织设计获得专业机构的支撑。S村社区学校并非各自为政，而是以县级社区学院分校的形式存在，因此其设计与运行离不开县级社区学院的支持，并且县级社区学院是以责任者而非帮扶者的身份参与到建设中。

3. 外界参与是社区学校发展的资源保障

尽管国家提出建立乡村社区教育组织的政策，事实上社区学校建设的经费来源并不明确，致使很多乡村因缺乏资源支持而难以建成稳定的社区学校。在此意义上，资源的支持对于乡村社区教育而言尤为重要。S村社区学校的资源需求到目前为止尽管已经进入自给自足的状态，但其也经历了资源短缺的建设期。资源短缺问题的解决主要得益于外界的支持。一是利用政府新农村建设的专项资金修建了教育教学场所，并配备了相应的设施设备，这形成了社区学校建设的硬件基础。二是国家与省级农业管理部门把S村作为农业示范基地建设，S村社区学校紧紧抓住农产业需要技术培训的契机，获得了相应的经费支持。三是在农业示范基地建设的光环下，S村社区学校获得了来自相关技术机构与地方行政事业单位免费的教师资源与经费支持，同时还获得了各级社区教育专家的支持。总体而言，S村社区学校的发展得益于外界的参与，外界的参与为其发展提供了资源保障。

4. 乡村精英是社区学校发展的引导力量

“‘乡村精英’群体是指在知识、经济、政治（国家的或者传统的家族意义）上拥有‘话语权’的人群”。^[6]他们在乡村社区建设中的作用不容小觑，尤其是在乡村全面建设的过程中更不能缺位。乡村精英具有较强的公心，通常从乡村全局的视角思考问题，因此村民较为信任他们，相信他们能把乡村带向更好的方向。在此意义上，乡村精英是引导乡村社区学校建设的重要力量。校长余某即属于S村的精英，自1988年从攀枝花钢铁厂车间支部书记离职回村后，他一直带领着村民建设乡村，先后被授予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百佳村党支部书记”、“全国劳模”等荣誉称号。鉴于其对S村建设的贡献，村民都很信任他，因此在他的领导下，村民较为乐意参与社区教育活动。此外，S村培育出一批年轻的精英，他们分别在种植协会、养殖协会、旅游协会等担任领导者的角色，他们都是村民致富的带头人，因此村民也较为信任他们并乐于在其引导下积极参与社区教育活动。

（二）S村社区学校发展存在的不足

1. 外出务工人员与青少年的参与度不高

乡村社区学校是为乡村全体村民服务的机构，但S村社区学校在外务工人员与青少年校外教育方面的关注不够，导致两者的社区教育参与度偏低。一是就外出务工人员而言，主要教育形式是利用其回家过春节的假期发放过进城务工人员防骗资料，其余的培训几乎未开展过。据执行校长周某回忆，“2012年在国家农民工培训政策的指引下我们实施过外出务工人员培训，但2012年以后的培训主要是针对在家里搞生产和居住的村民，因为我们培训的时候外出务工人员也不可能回来培训。现在全村的产业发展起来了，以后我们可能会利用春节期间对外出务工人员培训。”（2018年2月18日）二是青少年对社区教育活动的参与度也偏低。据校长余某所言，“村里修建了村史博物馆，青少年校外教育主要是偶尔让学生参观博物馆，了解我们村的历史。其他的教育都是由村小学自己实施，我们也不便于干涉。”（2018年2月18日）

2. 少量村民仍要求发放学习补助

S村尽管学习的氛围已形成，但社区学校发展之初是通过发放交通伙食补助引导村民参与学习，这也成为一种习惯。因此除直接解决问题的学习以外，很多政策与法制类的学习仍有村民索要学习补助。村民认为自己住的地方离社区学校距离远，来回必须坐车，同时学习结束还不能及时赶回家吃饭，因此要求给予其实际交通补助与生活补助。就S村社区学校的现实情况而言，社区学校仍有较为充裕的经费，因此有能力为参学村民发放交通与生活补助。通过调查发现这种情况在西部地区的乡村社区教育实施过程中较为普遍，如贵州省某乡村社区学校为吸引村民参加学习，交通生活补助已达到每天50元；成都市郊某社区学校给予学员的交通生活补助已达到每天100元。在经济允许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但是从社区学校的持续发展而言，这显然不利于社区学校的发展。当社区学校难以支付学习补助后，可能社区学校也就无法运行。

3. 周边环境削弱了社区学校的效果

乡村社区是开放的社区，社区之间本身难以有明确的界限，加上社区之间本身存在亲缘、血缘以及经济关系，因此社区教育的实施效果势必会受到周边社区的影响。调查发现，尽管S村社区学校的发展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周边村庄却在社区教育学校建设方面相对较差，致使S村社区教育的效果在居民与周边社区居民交往的过程中遭到了削弱。这种削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育效果在与其他社区居民交往中的自然性削弱。二是人为性的削弱，人为削弱指村民在与其他村民交往的过程中因接受社区教育经常遭到调侃、嘲讽，并且这种情况还不少见。如校长余某所言，“只有我们发展社区教育，周边乡村都不发展，我们的村民因社区教育常遭到邻村人的嘲笑与戏耍，所以我们认为社区教育的发展要全面铺开，这样才能保证效果。”（2017年12月18日）

四、S村社区学校建设对我国新型乡村社区学校建设的启示

有研究认为，“以2050年15亿人作为测算依据。有三个城镇化模拟方案：一个是保守方案。城镇化率达到70%，那么仍然有4.5亿生活在农村……。第二个是中等方案，城镇化率达到80%，仍然有3亿人口在农村……。第三个是乐观方案，城镇化率达到90%，仍然还有1.5亿人生活在农村。”^[7]因此结合现代乡村发展的特点，建设有别于传统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农村成人学校以及人口学校的新型社区学校已成必然，只有这样乡村社区学校才能有效发挥其促进乡村振兴的价值。S村建立社区学校可以说走在了同类乡村社区的前列，其经验与存在的问题给予同类乡村社区学校建设四个方面的启示。

（一）正确认识乡村社区学校的现代价值

社区学校价值的探究需要厘清社区、社区教育与社区学校三者间的关系。社区教育作为一种教育形态，其本身属于社区并服务于社区发展。社区学校是社区教育的实施机构，其目的是推动社区教育服务社区发展价值的落实。具体而言乡村社区学校具有三个方面的价值。一是有助于提升社区教育效率。社区教育包括随境式社区教育与有组织的社区教育，随境式社区教育具有随意性与偶然性，因此其效果相对较差。社区学校是专业的社区教育机构，其目的明确、运行有序，成效自然更高，尤其是在知识与技术更新速度加快的现代社会，社区学校能更有效地帮助乡村居民解决实际问题。二是有助于激发社区居民的创造力。社区是社区居民的社区，因此只有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学校建设的积极性，社区发展才具有动力与活力。社区学校类似于社区的“小智库”，它可以通过教育教学活动的开展激发社区居民建设社区的动力与活力，同时提供知识与技术支持。三是有助于提升乡村居民的文化凝聚力。学校是乡村文化的标杆，乡村文化滋养它但它也反过来引领乡村文化前进。在传统祠堂与庙宇等文化标志在现代乡村中逐渐失去其文化与精神引领价值的情况下，有必要重建新时代的文化象征，以此引领并凝聚社区文化精神，乡村社区学校则具有此价值。鉴于新型乡村社区学校在乡村建设中的价值，因此结合乡村发展的实际建设乡村社区学校是落实乡村振兴政策，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举措。

（二）坚持经济收益主导的建设原则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低层次需求是生存需求，经济是生存的基础，因此人的活动需要追求经济效益。乡村社

区学校的主体是成人，成人需要负担家庭的衣食住行等支出，能产生实际经济效益的学习更容易调动其学习的积极性。再者，在我国的经济体系中乡村经济几乎处于滞后的状态，甚至存在大量的贫困人口，因此当前我国乡村社区学校建设需要以经济收益为主要导向。经济收益主导并非仅单纯指直接产出经济收益，同时也包括间接为经济利益服务的教育活动。如健康教育、道德教育、法制教育与文化教育等都可间接地产生经济效益。

经济收益主导的社区学校建设原则主要包括三个维度的内容：一是学习活动与内容的设计要以实用为导向，重视居民生产生活中实际问题的解决。如帮助劳动力人口解决职业技能提升的问题，帮助健康欠佳的居民解决健康问题等。二是教育教学的实施要以效率为导向。教育教学的实施需要坚持经济性原则，在追求学习效果最优化的同时尽可能降低学习的时间、交通与食宿等经济成本。三是教育教学的评估要以实用性为导向。在坚持经济性原则的前提下，评估既要重视过程性材料的搜集，更要以居民的学习成果及其转化情况为依据。坚持经济收益主导的原则并非不重视非经济类教育活动，而是把经济性较弱的教育内容有机地融入经济获得中。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当学习成为村民的自觉习惯后，适时把非经济主导的教育活动独立开展。随着乡村经济水平的提升，当经济问题不再是乡村居民面临的主要问题后，社区学校建设可以逐步弱化经济的重要性。

（三） 探索社区主导的多主体协同建设机制

乡村社区学校是社区居民自己的学校，因此社区居民是乡村社区建设的主体。就现实的情况而言，多数乡村在社区学校建设过程中都存在主体力量不够的情况，因此社区学校建设需要寻求外界的支助，探索适合社区自身特点的以社区为主体的多主体协同建设机制。一是争取国家财政资金支持。乡村社区学校建设本身属于民生工程，且是在国家政策的要求下进行。现实问题是当前我国的多数乡村社区自己难以完成社区学校建设的任务，因此借助国家的政策契机争取财政资金支持是推动社区学校建设的重要渠道。二是争取外界的智慧支持与物资支持。就现实而言，部分乡村社区自有的力量难以完成社区学校建设，因此社区学校建设需要争取外界的智慧支持与物资支持，尽可能提升乡村社区学校建设的水平。三是吸引或培育乡村精英的参与。乡村精英外流削弱了乡村社区发展的内在凝聚力与引导力，因此乡村社区学校的建设需要结合乡村全面发展的实际状况，引导乡村精英参与社区学校建设。同时注重新乡村精英的培养，以保证乡村社区教育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四是充分发挥乡村常住居民的主体力量。就目前而言常住居民是乡村社区学校建设最直接的参与者与受益者，因此在社区学校建设过程中要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引导其真正成为社区学校建设的主体。多主体的参与可能会导致建设思路上的冲突或者造成资源的浪费，因此社区学校建设主要责任者需要结合实际探索多主体协同建设的机制。

（四） 构建实体与虚拟融通的学习平台

乡村社区学校的建设要服务于全体村民，然而因乡村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务工，因此传统的学校实体难以服务乡村社区居民的学习。在此情形下，乡村社区学校的建设需要构建实体与虚拟融通的学习平台。实体平台的建设事实上即按照学校实体的形式建设社区学校，主要包括社区学校建设目标、教育教学内容、硬件设施设备、管理与师资队伍以及运行机制等。实体学校主要以留守居民为教育对象。虚拟学习平台是信息化背景下社区学校建设不可避免的趋势，其目的在于构建“任何人（anyone）、在任何时间（anytime）、任何地点（anywhere）、以任何方便的形式（anyway）获取任何想要的知识（anyknowledge）”^[8]的“5A”学习模式。具体而言，社区学校的建设要以实体学校建设为依托，在部分乡村已有的现代远程学校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构建在线学习平台，外出居民可以通过在线学习平台享受社区学校的福利，平台也可以为留守居民的学习提供便利。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居民信息技术水平的提升，虚拟的学习平台更适合乡村居民分散居住难以集中学习的特点。

参考文献：

[1]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 中国教育年鉴:2015[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6:97.

-
- [2] 杨智, 潘军.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社区教育的价值再认及其实现理路口]. 终身教育研究, 2018 (5) :49-55.
- [3] (加) 明茨伯格. 卓有成效的组织[M]. 魏清江, 等,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5.
- [4] (美) 达夫特 (Daft, R. L.). 组织理论与设计:第 10 版[M]•王凤彬, 等, 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29.
- [5] (美) 彼得•圣吉. 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践[M]. 张成林, 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9:259.
- [6] 韩福国, 宋道雷. “穷根”与“翻身”: 第二次乡村变革后的精英再生产机制研究[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 (3) :115-130.
- [7] 周立. 展望 2050:中国城乡一体化图景[J]. 经济研究导刊, 2015 (8): 50-53.
- [8] 齐幼菊, 尹学松, 厉毅. 现代信息技术环境下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J]. 远程教育杂志, 2010 (8): 79-83.